

翻譯異國、想像中國： 張若谷譯《中國孤兒》探析

陳碩文

1939年，張若谷將伏爾泰 (Voltaire, 1694-1778) 知名的劇作《中國孤兒》 (*L'Orphelin de la Chine: la morale de Confucius en cinq actes*) 譯成中文，在上海《中美日報》連載，1940年出版單行本，亦名為《中國孤兒》。事實上，紀君祥的元雜劇《趙氏孤兒》首先乃由傳教士馬若瑟 (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 於1735年譯為《中國悲劇：趙氏孤兒》 (*L'orphelin de la Maison de Tchao, tragédie chinoise*)，傳入西歐；繼之，伏爾泰再改寫為《中國孤兒》(1755)，此故事乃更廣為人知。《趙氏孤兒》與《中國孤兒》的翻譯公案，已是國內外漢學界頗為人注意的議題，然張若谷於中國對日抗戰期間在上海翻譯的此一中文版本，卻少為人所留意。本文比較伏爾泰的《中國孤兒》與張若谷之翻譯，將翻譯看作是譯者對此前翻譯的再詮釋與跨文化轉化，並參酌歷史情境的考察，以探析張若谷於中日抗戰期間翻譯《中國孤兒》，想像新中國的文化意涵。本文指出，張若谷的翻譯雖不是完美的翻譯，其出發點是為了通過對異己的思考來充實豐富自身的文化。尤其，伏爾泰的異國情調論述更曾為張若谷所推崇，欲效法他以翻譯異國文藝來更新本國文藝，進一步復興國族。張若谷的《中國孤兒》翻譯由是呈現了跨文化的雙重凝視，並勾勒出一張從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的全球文化流動圖景。本文並考察張若谷的《中國孤兒》翻譯，如何通過重新詮釋異國人眼中的中國，以召喚、肯認中國文化主體。

關鍵詞：趙氏孤兒、中國孤兒、張若谷、伏爾泰、文化翻譯

收件：2015年4月12日；修改：2015年6月14日；接受：2015年6月26日

陳碩文，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E-mail: shuowinchen@gmail.com。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異國、都會與跨文化接觸：張若谷的創作、翻譯與1930年代上海都會文化 (NSC 102 - 2410 - H - 005 - 060 -)」部分研究成果，特此致謝。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在論文的審查及修改過程中提出的建議，筆者獲益良多。本文部分研究成果曾先以會議論文形式，在2014年於葡萄牙舉行的歐洲漢學會議發表，感謝同一小組的發表人關詩珮教授、潘少瑜教授以及其他學者先進所給予的回饋、指點。本文得以完成，還要感謝鍾欣志教授慨借參考資料，羅仕龍教授提出寶貴指教，也在此一併致上謝忱。

Translating the Other, Imaging the Self: A Study of Zhang Ruogu's Translation of *L'orphelin de la Chine*

Shuowin Chen

In 1939, Zhang Ruogu translated Voltaire's (1694-1778) well-known play *L'Orphelin de la Chine: la morale de Confucius en cinq actes* into Chinese. It was published as a series in Shanghai's *China-America Daily*, and later as a book entitled *The Orphan of China* in 1940. In fact, before Voltaire's work was published, Ji Junxiang's *The Orphan of Zhao* was first translated into French by the missionary 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 in 1735. It was called *L'Orphelin de la Maison de Tchao, tragédie chinoise*. It was very popular in Western Europe for a time, and therefore Voltaire adapted it as his drama *The Orphan of China* (1755), which became the better-known version. The issues surrounding the translations of *L'Orphelin de la Maison de Tchao* and *The Orphan of China* have captured the interest of scholar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However, only a few have taken note of Zhang Ruogu's translation of *The Orphan of China*. This paper compares Voltaire's *The Orphan of China* with Zhang Ruogu's translation and sees Voltaire's adaptation as a transcultural reinterpretation of its predecessor. The paper also makes certain observations regarding the historical context – the fact that Zhang Ruogu's Chinese translation was done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 and analyzes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s. It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this Chinese translation was not perfectly faithful; rather, it could be viewed as a transcultural practice whereby a translator sought to enrich his own culture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he “other.” Zhang Ruogu admired Voltaire's discourse on exoticism and emulated him by using translation as a means to renew his own national culture and revive his n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ways in which Zhang Ruogu's translation of *The Orphan of China* constructed a China that was clearly different from, and perhaps more exotic than other nations, and thus affirmed the selfhood of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The Orphan of Zhao*, *The Orphan of China*, Zhang Ruogu, Voltaire, cultural translation

Received: April 12, 2015; Revised: June 14, 2015; Accepted: June 26, 2015

壹、前言

1735年，紀君祥的元雜劇《趙氏孤兒》由傳教士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節譯為《中國悲劇：趙氏孤兒》(*L'orphelin de la Maison de Tchao, Tragédie Chinoise*)，傳入西歐；繼之，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再以之為基礎改寫成《中國孤兒》(1755)一劇，此故事乃更廣為人知。1939年，張若谷(1905-1960)將伏爾泰的《中國孤兒》(*L'Orphelin de la Chine: la morale de Confucius en cinq actes*)譯成中文，在上海《中美日報》連載，1940年出版單行本。《趙氏孤兒》與《中國孤兒》的翻譯公案，已是國內外漢學界頗為人注意的議題，然張若谷於中日戰爭期間在上海翻譯的此一《中國孤兒》中文版本，卻少為人所留意。本文對照閱讀伏爾泰的《中國孤兒》原文與張若谷之中文譯本，考察張若谷的翻譯策略，將此中文翻譯看作是譯者的再詮釋與跨文化實踐，並參酌歷史情境的考察，以探析張若谷於中日戰爭期間翻譯《中國孤兒》的文化意涵。

本文分成三個部份：一、參酌前人研究成果，耙梳從元劇《趙氏孤兒》到伏爾泰《中國孤兒》的翻譯行旅。二、對照閱讀張若谷之《中國孤兒》譯本與伏爾泰原作，探究張若谷的翻譯策略與成績。三、從對異文本的再詮釋與跨文化實踐的觀點，縮結對文化脈絡的分析，探討張若谷《中國孤兒》譯本之意涵。

貳、從《趙氏孤兒》到《中國孤兒》

紀君祥的雜劇《趙氏孤兒》，取材自春秋時期的歷史事件「下宮之難」，此一史實可見於先秦的《春秋》、《左傳》、《國語》、《公羊傳》，漢代的《史記》、《說苑》、《新序》、《論衡》，唐代的《蒙求記》以及宋代的《容齋隨筆》。《趙氏孤兒》一劇之背景為晉靈公時，描述春秋時期晉貴族趙氏被奸臣屠岸賈陷害，慘遭滅門，倖存的趙氏孤

兒趙武長大後為家族復仇的故事。紀君祥在元朝寫就此劇，其中程嬰救趙孤的情節，易使人聯想起宋朝傾覆時，宋人種種壯烈殉國事蹟。

明代臧懋循(1550-1620)的《元曲選》(別題《元人百種曲》，1616)所收《趙氏孤兒》，較紀君祥所著多一折，共五折。劇末安排復仇情節，強調義士節義，並由晉國國卿魏絳公斷案。此一由國家決斷、剷奸除惡情節的增補，如研究者所指出，頗顯示出時人對於道德與政治合流的期待(宋耕譯，2001)。

耶穌會神父馬若瑟乃首將《趙氏孤兒》節譯成法文之人，名為《趙氏孤兒》(*Tchao-Chi-Cou-Ell, ou Le Petit Orphelin de la Maison de Tchao*)。但其譯本只有賓白，而無唱詞；並將中國傳統戲曲形式略加改變，將「折」譯為「幕」(acte)，又細分不同的景(scene)。馬若瑟託人將翻譯完成的劇作送往法國，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 1673-1743)將該劇收入自己的《中華帝國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於1735年出版。¹馬若瑟的翻譯，據前人研究，各家評價不一。安田樸(René Étiemble, 1909-2002)認為馬若瑟刪除原劇曲詞，顯示馬氏對中國戲曲不瞭解(許鈞、錢林森譯，2008，頁101)。陳受頤的評價也不高，並覺得譯者未能恰當補拙(陳受頤，1929，頁115)。杜欣欣從翻譯主體的研究角度，考察此翻譯與馬若瑟個人思想、視野之關係，並指出，此譯本於翻譯倫理無違背，對大文本環境也貢獻良多，更提供了西人想像中國的依據(杜欣欣，2010)。

1753年，伏爾泰據馬若瑟的劇本改寫此劇，名為《中國孤兒：五幕孔子道德劇》(*L'Orphelin de la Chine: La Morale de Confucius en Cinq Actes*)，全劇共五幕。1755年8月，《中國孤兒》在巴黎的法蘭西劇院(Comédie Française)首演，獲得極高評價(Liu, 1953)。伏爾泰盛讚《趙氏孤兒》為「……一篇寶貴的大作，它使人了解中國精神，有甚於人們對這個龐大

¹ 杜赫德解釋，這齣戲象徵中國人熱愛道德，厭惡邪行的精神；而他在書中收錄此劇，則有著向西方人展現中國道德情操的含意。

帝國所曾作和所將作的一切陳述。」（范希衡譯，2010，頁 86）。

學者多指出，伏爾泰之所以會選擇改編此劇，並對此所謂「中國精神」多有推崇，實乃有其文化脈絡。自十七世紀起，中國藝術、思想傳入法國，在藝術界、思想界都發生了影響，崇尚中國幾乎成為當時一種風潮（許鈞、錢林森譯，2008，頁 149）。通過傳教士的（尤其是耶穌會士）的著作，時人對於中國文化、思想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中國人的思想、信仰不但曾引起了當時的神學家、哲學家莫大的關注，中國人的宗教思想是否為自然宗教、中國人的禮儀是否為偶像崇拜等議題，更在入華宣教的耶穌會士及歐洲天主教會之間掀起論爭。早在完成《中國孤兒》之前，伏爾泰對於當時法國神學界所普遍宣揚的世界觀及基督教文化中心論已頗多不滿，儘管他曾為此入獄，數次逃亡。墊基於從耶穌會士處得到的關於中國的知識及他對教會思想的反思，1734 年，伏爾泰出版《風俗論》(*Essai sur les moe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將對中國文明的描述置於卷首，從而質疑了聖經歷史是人類歷史文化中心的說法 (Pinot, 1932)。伏爾泰推崇中國人的法律、風俗都遵循著純潔的道德，相比之下，他認為歐洲卻正陷入污穢和腐化的偶像崇拜當中，因此伏爾泰將中國視為歐洲文明的老師。伏爾泰更認為，中國的文明之所以能如此昌盛地運行不輟，得歸因於寬容、開明的君王，在他的詮釋下，中國的君王類似哲學家皇帝（許鈞、錢林森譯，2008，頁 203-204），並非法國相信君權神授的君王可以比擬。

而伏爾泰如此的思考脈絡，也影響了他《中國孤兒》的翻譯／改編策略。因此，雖然其劇作的靈感來源為紀君祥的《趙氏孤兒》，但在故事發展、人物形象上，《中國孤兒》與《趙氏孤兒》多不相侔。

首先，該劇的時代背景設定在南宋末年，成吉思汗攻陷北京之時；此外，劇中角色設定亦與《趙氏孤兒》完全不同。伏爾泰改編的《中國孤兒》描述宋皇在國破時分、臨死之前向大臣張惕 (Zamti) 托孤，成吉思汗四處搜捕大宋遺孤，以求斬草除根。張惕遂欲以親生兒子冒名頂替大宋遺孤。其妻伊達美 (Idamé) 雖然支持丈夫，但強烈的母愛又使她難

忍悲痛，乃向成吉思汗道出實情，企求保住親子性命。而成吉思汗早年流落北京時，曾愛慕伊達美，但求婚遭拒，於是便以其夫、其子及大宋遺孤三人的性命脅迫，再次向伊達美求婚。伊達美仍以國家為重，拒絕了逼婚，並積極救孤；而已下獄的張惕，面對著征服者的嚴刑，也不改初衷。救孤失敗後也被捕入獄的伊達美，決定與丈夫一同自刎以報先皇。成吉思汗得知後十分震驚，下令赦免張惕夫婦，邀請張惕留在宮中任官，以中華民族的高度文明教化元朝百官，並收大宋遺孤及張惕之子為義子。

從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伏爾泰《中國孤兒》與紀劇最大的不同，乃在伏爾泰於紀劇的基礎上，添加了象徵文明的中國遺民與代表野蠻的蒙古大軍鬥爭，最終仍由文明戰勝野蠻的情節安排，而關於此，伏爾泰在獻詞中這樣說道：

這是一個偉大的實例，說明理性與天才對盲目、野蠻的暴力所具有的優越性……當他們在上世紀初又征服了這廣大帝國的時候，他們再度降服於戰敗者的文德之下，……這個引人注目的大事就是我的作品的最初目標。（范希衡，2010，頁84）

此外，在《中國孤兒》一劇中，伏爾泰還刻畫張惕擁有高尚美德，面對保家救國的雙重考驗時，卻情願捨生取義，讓野蠻的君王成吉思汗也臣服其下；最後成吉思汗不但諒宥了張惕，還請他擔任朝中要職，協助其以美德和文明教化天下，可見以儒家為主體的中華文明道德優越。伏爾泰不但將張惕視為孔子的化身，且如同安田樸所指出，伏爾泰很清楚 Zamti 音同 chang-ti ——中文的上帝（許鈞、錢林森譯，2008，頁125），而其之所以如此設定角色，乃為了向法國觀眾傳遞了儒學著重人的情感和倫理規範，而非外在的崇拜或神秘信仰的思想，由此從而質疑了教會主流思想及王權學說。

另外，考察伏爾泰創作此劇的時代背景，我們還會發現伏爾泰之所

以選擇改寫耶穌會士馬若瑟所翻譯的此劇，也是為了回應伏爾泰當時面對的哲學環境，象徵了其對啟蒙理想的捍衛，及對同時代的思想家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所提出的自然觀之回覆（范希衡，2010；陳受頤，1929；陳正敏，2008）。《中國孤兒》寫於 1755 年，當時盧梭出版了他著名的《論科學與藝術》(*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在這些著作中，盧梭首先反對啟蒙哲學，並認為藝術、科學的成熟只會帶給人們不幸，轉而歌頌原始城邦的生活。同當時潮流之所趨，盧梭在其著作中也以中國為例，視中國為被文明腐蝕的大帝國，而如此龐大的帝國，最終還是敗給了野蠻的韃靼，足以證明文明昌盛不足為道。盧梭的學說在當時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對，其中包括了伏爾泰。因此當伏爾泰改編《中國孤兒》一劇時，將時代背景安排在宋末元初，並在劇中刻畫成吉思汗雖征服了中國，但驍勇善戰的君王最終還是為中國文明衷心折服之劇情設定與安排，皆可視為伏爾泰對盧梭學說的回應。

綜之，伏爾泰《中國孤兒》一劇呈現出了其對中國德治天下的推崇和想像、對道德的欽慕，如同伏爾泰在其他文本中所表現出的對中國理想化的描述，實際上都有著憑藉異國資源，構築其理想世界，以諷刺法國沒落王權和腐敗教會的意圖，此亦即法國學者所說的，《中國孤兒》一劇乃伏爾泰將他對中國精神的發現「舞台化」之成果（董純、丁一凡譯，1991）。

除此之外，亦有學者指出，伏爾泰對《趙氏孤兒》的改編，也很好地反映了當時法國的戲劇風尚（范希衡，2010）。法國悲劇共有五幕，採用亞歷山大詩體，規範嚴謹。伏爾泰改編《趙氏孤兒》，亦為詩劇，並將發生在數十年間的故事濃縮在幾小時內，劇作背景都設在北京某一處。《中國孤兒》和原作在人物角色上最大的不同，還有伏爾泰增加了女性角色的戲份。伏爾泰《中國孤兒》一劇中的成吉思汗雖是一驍勇君王，卻長年戀慕伊達美，兩人間的情感糾葛在原劇中並無。如同法國學

者指出，在當時的巴黎，飾演伊達美的女演員克萊隆頗負盛名，尤善感情戲，必須為她安排情節（董純、丁一凡譯，1991）。此外，查伏爾泰的自敘，他也曾提到，若整齣劇只有道德說教，而沒有感情安排，或有使法國觀眾觀之不快的危險 (Voltaire, 1755)，因此方做了這番改動。

從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改寫歷史故事，或翻譯、譯述不同語言的文本，其情節、人物等與原作不同，其間變化，實屬正常。前者有學者視作是對史實的演述，或史與詩的對話（李紀祥，2000）；而後者，則可以被看成是一種文化翻譯，展現了兩種不同文化的跨文化接觸。對劇場進行跨文化研究的學者也會同意，在不同背景的影響下，不同的劇本或演出會展現出各自的變化 (Pavis, 1996; Schechner, 2002)。因此，在研究翻譯文本或者戲劇作品之時，原本與譯本的異同已經不完全是研究者考察的重點，譯者的翻譯意圖、脈絡或策略，乃至於所形成的效果、所呈現的跨文化碰撞或融合，更是現今研究者主要關注之處。

從上述角度，對伏爾泰之《中國孤兒》進行研究者，所在多有；然而，伏爾泰《中國孤兒》一劇在現當代的中文翻譯，卻相對較少人關注。早在民初，作家張若谷便將伏爾泰此劇譯成中文，此一翻譯公案更幾乎無人留意，下文即對張若谷的翻譯展開研究。

參、《中國孤兒》的中國旅行

張若谷，上海人，曾任記者、編輯、作家、教授，《異國情調》、《都會交響曲》是其較知名的作品。除寫作外，他也是譯者，積極評介異國文藝思潮，並提倡讀者從閱讀翻譯文學始，致力於創新現代中國文學。對日戰爭期間，張若谷曾短暫在震旦大學任教，後轉任戰地記者，出版《戰爭飲食男女》等文集。上海淪陷後，因中文出版頗受限制，張若谷遂多在《中美日報》等報刊發表文章。1949年後，張若谷作品不多，至1955年，他更因宗教原因招致抄家橫禍，並被遣送至東北勞改農場

勞動，1967年便因病去世。²

1939年，張若谷將伏爾泰的《中國孤兒》譯成中文，在上海《中美日報》連載，名之為《成吉思汗》，後改名為《中國孤兒》，1942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張若谷在序中自述，他之所以著手翻譯《中國孤兒》，是因為讀了張元濟(1867-1959)《中華民族的人格》(1937)一書所受到的啟發，因此，以下有必要談談張元濟此書。

張元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所主持的商務印書館，編譯、出版了包括中小學教科書在內的許多中國現代重要文學相關作品。張元濟寫成《中華民族的人格》之際，正值蘆溝橋事變前夕，上海亦危在旦夕，於是他自《史記》、《左傳》、《戰國策》取材，以培養「堅苦卓絕的精神，高尚廉潔的節操」為旨，使「中華民族復興」為目標（張元濟，1937，頁2-3），完成了八篇故事，其中便包括了程嬰救孤本事。張元濟認為這篇故事充分體現了儒家理想人格的偉大，而在這中華民族存亡的緊要關頭，此一精神實值得再次書寫，以作為國民典範（張元濟，1937，頁2-3）。³

張若谷自稱，因受到這本書的啟發，遂決定著手翻譯伏爾泰的《中國孤兒》，同張元濟編寫歷史故事之情懷，張若谷亦有所寄託。如上段所述，伏爾泰改編《中國孤兒》，強調文明終會戰勝野蠻，稱許中國文明與孔子思想優越，實也寄託了伏爾泰一己之理想，方將原劇中描述的「忠孝節義」置換成了「自然情感」（尉天驄，1977）。張若谷《中國孤兒》中譯之寄託，則是要使當時的一般中國讀者發現伏爾泰在此劇中對中國文化的推崇，以見中華文化的淵遠流長，無遠弗屆。張若谷認為，

² 此乃據他家人回憶所言，另有一說是在他在1949年以後入獄，出獄後於1960年逝世。請見周允中（2000）。

³ 張元濟在〈編書的本意〉中指出：「我現在舉出這十幾位，並不是什麼演義彈詞裡妝點出來的，都是出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讀的書本裡。他們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舉動也不同，但是都能夠表現出一種至高無上的人格。有的是為盡職，有的是為知恥，有的是為報恩，有的是為復仇，歸根結果，都做到殺身成仁，孟夫子說是大丈夫，孔聖人說是志士仁人，一個個都毫無愧色。這些人都生在二千多年以前，可見得我中華民族本來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謹守著我們先民的榜樣，保全著我們固有的精神，我中華民族不怕沒有復興的一日！」（張元濟，1937，頁2-3）

此一戲劇作品之文化感染力既感動得了伏爾泰，想必在國難當頭的戰亂時刻，亦能刺激一般讀者的愛國熱情，使得中華民族精神再興，有助於救國。

以上為張若谷自陳翻譯此劇的前因，然而其翻譯實績究竟如何呢？張若谷談他的《中國孤兒》翻譯，以如「春蚓秋蛇」自況（張若谷，1942，頁1），但他所譯的《中國孤兒》是否真是不完整的節譯？其譯本，究竟與原作有什麼差異？而我們又該怎麼解讀？則是下文的研究重點。

據筆者考察，雖然張若谷在他的譯本中保留了伏爾泰五幕劇的形式，劇中人物亦全譯出，但張若谷偶將此劇本略做刪節，或合併若干場（如第二幕的第五、六場、第五幕的第三場亦整場刪除），並將伏爾泰以詩劇形式寫成的劇本稱為「有韻的戲曲」，在翻譯成中文時，主張譯為「無韻的白話劇本」（張若谷，1942，頁51）。後人於是論及張若谷的翻譯，評價張將此劇譯成了散文，失去了原作的精神（范希衡，2010，頁199）。

此外，對照伏爾泰的法文原文與張若谷的中文譯本，我們還可發現幾個不同之處。

首先，先談談情節段落的刪補。張若谷之譯本，將伏爾泰劇中提到日本的事蹟都刪去，如第五幕第五場中，伊達美勸說張惕效法日本人不願苟活的精神自盡之處。二、劇末張惕受元祿一事也被刪去。張若谷這麼說：

劇中有涉及日本民族之處，亦屬不實；劇終以盛悌（筆者按：張若谷譯 Zamti 為盛悌）受元祿事為結束，似有沾污其人格之譏，故皆予以刪節。（張若谷譯，1942，頁1）

張若谷翻譯此劇時正值中國對日戰爭如火如荼進行之際，出自澎湃的愛國情操，張若谷將伏爾泰原劇中涉及讚揚日人精神，並描述主人翁事奉二君的段落刪除，此舉雖不忠於原著，但亦有後來的研究者認為這

種刪改是「可以理解」的（范希衡，2010，頁76）。從此已經可以驗證，若翻譯可被視為一種對原著的再詮釋，那麼其經歷，從以上的例子來看，實際上還與本地文化主體的認同息息相關。從此我們也可以看出，譯者所面臨的翻譯情境，的確會為他的翻譯實踐帶來了侷限，終使張若谷的《中國孤兒》中譯呈現了並不完整的面貌。

接著，對照伏爾泰的《中國孤兒》文本與張若谷翻譯，我們還會發現張若谷有時會對伏爾泰的劇本添加補充說明。

首先，伏爾泰的《中國孤兒》靈感既來自元劇《趙氏孤兒》，而其劇本的時地脈絡也皆設定於中國，張若谷將之翻譯成中文時，會從中國人的角度，對伏爾泰原文進行補充式的翻譯，如文中只稱被蒙古大軍摧毀的中國原王朝為“L’empire”，張若谷精準譯為「大宋」；伏爾泰劇中強調張揚救亡存孤，精神可嘉，張若谷則將之譯為「盡忠」。還如第一幕第六場，原文作：

Songe au Roi que tu dois conserver. (Voltaire, 1755, p. 13)

張若谷譯為：

你應當盡忠報國，不忘大宋皇帝的恩澤。（張若谷譯，1942，頁12）

在這些段落中，我們都可以發現，在伏爾泰劇中不那麼被強調的忠君愛國精神，通過張若谷的翻譯，卻出現在中國讀者眼前。

此外，張若谷的譯本對原劇人物心理及形象的呈現，也偶有更動。

比如劇中堅忍不屈的孤臣張揚，雖決定以自己的兒子頂替皇子以救孤，但畢竟血濃於水，面對此一決定，伏爾泰刻畫他心中亦心痛難當 (Voltaire, 1755, p. 14)。然而在張若谷的翻譯中，此處張揚的心情轉折卻受到淡化。此外，伏爾泰原劇描述伊達美大義凜然，拒絕成吉思汗求親，

但伏爾泰刻畫她回想過去時，仍承認當時被成吉思汗求愛時，並非完全不心動。她說：

L'univers n'étoit pas, Seigneur en votre main;
Elle étoit pure alors, me fut présentée;
Apprenez qu'en ce temps je l'aurais acceptée. (Voltaire, 1755, p. 40)

整個的世界，大人，還不在你的手掌，
你的手是純潔的，你伸來向我求愛：
請你知道我那時並不是無動於懷。（范希衡譯，2010，頁162）

這一段伊達美的心情表白，在張若谷的中文譯本中，則乾脆刪去不提。

凡涉及劇中角色面對大難，心情有所動搖、脆弱的段落，在張若谷的翻譯中都較原著有所刪節，其譯本中的中國人物形象都顯得堅忍、勇敢，進一步究其原因，恐怕得歸因於張若谷翻譯此劇的初衷，即為了彰顯中國人的民族氣節。在這樣的翻譯前提之下，也難怪劇中人物凡是面臨情感糾葛的情節陳述，通常都會被張若谷刪去不譯。

此外，以上這類缺譯，識者會指出，所彰顯的是中西戲劇傳統之異，顯示出張若谷對西方戲劇中情理糾葛的心理描寫特色不甚了了。上文也曾指出，伏爾泰添加這段感情戲，可能出自對票房的考量；另一可能則是，伏爾泰藉著描述伊達美與成吉思汗的情感糾葛，最終都在道德的感化下，得到了昇華，正為了體現出伏爾泰所歌頌的中國人情感與倫理的統一——此一他所亟欲傳遞給法國觀眾的思想內涵，於是方有此改編。張若谷此處的缺譯，弱化了伏爾泰在此劇中通過人物心理的刻畫以推崇中國式道德的企圖，顯示了張若谷對伏爾泰創作《中國孤兒》的詮釋脈絡及意圖似乎不甚瞭解，然而，張若谷刪除、弱化此段情節之事，更值得注意的面向恐怕還在於，張若谷翻譯此劇，初衷既為彰顯民族品德、

鼓舞士氣，自然容易選擇性地不突出人物間的情感糾葛，反要凸顯中國人物的大是大非精神。

除刪節外，張本偶也在翻譯中對原文有所潤飾，增添了原劇沒有的修辭。

比如伏爾泰在其戲劇作品中，著重呈現張惕救孤於危亡時所展現的承擔風骨；而張若谷翻譯時，多加上了幾句話。原文作：

Nous remettrons bientôt au chef de la Corée
Ce tendre rejeton d'une tige adorée
Il peut ravir du moins à nos cruels vainqueurs
Ce malheureux enfant, l'objet de leur terreur.
Il peut sauver mon Roi. Je prends sur moi le reste.(Voltaire, 1755, p. 12-13)

這不幸的嬰兒啊！是暴敵搜求對象
高麗王至少能夠帶走他免受摧殘
他能救我的幼君。其餘的責任我負。（范希衡譯，2010，頁 109）

張本譯為：

……過了相當時期，再送他到高麗去，希望太子生長到成人的時候，能夠回到中國來替他的父皇報仇。（張若谷譯，1942，頁 11）

譯者在翻譯加上了張惕希望太子長大成人時，能回到中國報仇的句子，使得張惕這個角色的性格變得更加剛烈，也使得整部戲劇更為高潮迭起。

由於張若谷翻譯此劇的動機，是受張元濟《中華民族的人格》一書

之影響，在《中國孤兒》最後一場戲中，當張揚詢問成吉思汗為何一變以往兇殘的態度，而願意寬待他們時，張若谷的翻譯稍與原文不同，也就變得可以理解了。原文作張揚問：

Qui peut vous inspirer ce dessin? (Voltaire, 1755, p. 56)

成吉思汗回答：

Vos vertus. (Voltaire, 1755, p. 56)

而張若谷則將此句譯為「你們的人格」。（張若谷譯，1942，頁50）

張若谷還說，從此劇末段如此便可見得西方讀者對中國人格的敬佩，以及西方學者對中國文化之崇拜（張若谷，1942，頁52）；而他認同張元濟：只要能秉守這令人景仰的固有道德，則中華民族不怕沒有復興的一日。由此，譯者通過此劇之翻譯傳達其愛國精神的意圖，即更為昭然若揭了。

經過比對伏爾泰的《中國孤兒》與張若谷的譯本，我們可以發現，張若谷的翻譯雖稱不上完美、忠實，但大致不錯。原劇中若干修辭，於戰爭期間，因不符合譯者的民族情感與期待，有所刪節；人物形象也因這些刪減或補充，變得較原劇更為堅忍。在伏爾泰的《中國孤兒》中並不特別強調的「忠孝節義」精神，在張若谷的譯本中則再次出現。由此，我們要追問的是，難道張若谷的譯本真的是一個失敗的翻譯？對此翻譯文本間的差異，我們可以怎麼理解，或進一步分析呢？

肆、翻譯作為一種想像： 張若谷的《中國孤兒》翻譯

由以上兩劇之對比，我們可發現，《中國孤兒》的翻譯，涉及了一個文本從中到西、又由西回到中的文本旅行歷程。張若谷的《中國孤兒》中譯並不是完美的翻譯，其中偶有增刪。不過，近來學者多指出，翻譯，不只是一個相異語言的轉換過程，也可說是一個再現的過程，涉及了文化意義的轉移，以及譯者如何詮釋他者、想像自身的策略等問題。而在這個詮釋的過程中，譯者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譯者的位置與其所身處脈絡的互相作用，如貝曼 (Antoine Berman, 1942-1991) 所言，都會使譯者的主體性影響其詮釋他者的角度 (Berman, 2009, pp. 64-112)。因此下文將略耙梳張若谷的翻譯觀及其所處的文學脈絡。

1930 年代開始活躍於上海文化界的張若谷，已是一個積極的譯者，《中國孤兒》並不是張若谷唯一翻譯過的外文作品，伏爾泰也並非他第一次接觸的法國作家。早在於天主教徐匯公學就讀時，張若谷便自陳因受到法國神父影響，對法國文學頗感興趣（張若谷，1928，頁 45）。根據張若谷的回憶，在學校讀書時，他所接觸的多是經典法文作家的作品，伏爾泰也自然早為他所熟悉。除了就讀法國學校的淵源，使張若谷頗熟悉法國文學；文化活動特別蓬勃的上海法租界此一跨文化接觸點 (transcultural site)，⁴ 對張若谷法國文學興趣的培養亦是很大的。而上海蓬勃的出版市場、多元的都市文化空間，也為年輕作家如張若谷投身翻譯、寫作與參與文壇工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張若谷的文學生涯發展，可以說萌芽於上海，成長於本地和世界的文化流動、知識聯繫中。雖然

⁴ 法國人當時大力在上海法租界中提倡法國風 (Francophone)，除了成立協會組織，還專辦演奏會、展覽，並邀請名人演講。法國租界因此被當時上海人認為是一個較有文化氣息的地區，而對法國文化有興趣的上海青年，也因此通過參與這些活動，接觸來自異國的文化。請見熊月之、馬學強編 (2003，頁 113)。像上海這樣一個多元文化接觸、碰撞的地點，有學者稱之為跨文化地點 (transculturated site)，是多元文化接觸、碰撞、轉化的空間。Peng Hsiao-yen (2010, p. xi)。

他開始創作時還未曾出洋留學，但從他的跨文化視野，以及由傳教士、教會學校、法租界的文化活動與張若谷文學事業的聯繫身上，我們可以看出三十年代上海租界文化脈絡中的文化流動樣態的細節，以及其時其地知識與權力如何產生互動。

因長期接觸法國文學，張若谷由喜愛閱讀、評介而嘗試翻譯，乃意想中事。張若谷最早開始翻譯的西方文學作品應為拉封丹 (Jean de La Fontaine, 1621-1695) 的寓言 (現又譯做拉封登)。⁵ 此外，他也陸續翻譯過穆杭 (Paul Morand, 1888-1976)、法郎士 (Anatole France, 1844-1924)、莫郎 (George Soulié de Morant, 1878-1955) 等現當代法國作家的作品，並熱衷於在報刊上譯介歐洲文學思潮。

張若谷為何致力於翻譯工作呢？張若谷的翻譯態度可見於他為自己《異國情調》一書所做的序中。張若谷在文中響應曾樸所說的「異國情調」文學 (張若谷, 1929, 頁 15)，認同所謂的「異國情調」文學能借助外來的潮流，刺激本國文學的發展。張若谷在此序中並以伏爾泰所言為例：「文學即如爐中的火一樣，我們從鄰居借火把自己點燃，然後再轉借給別人，以致為大家所共有。」張若谷認為這是「一國文學受異國的影響或影響到異國的一絕妙譬喻」 (張若谷, 1929, 頁 13)。

而為使中國創作者、讀者更易於借鑑異國文學，翻譯，自是不可或缺，更是以異國文學的火種點燃本國文學之改良的觸媒。自 19 世紀以來，多數中國作家與譯者，都將翻譯異國文學帶來的影響視作是刺激本地作家改良傳統文學的良藥，⁶ 張若谷也並不例外。通過翻譯，將異國文學介紹進入中國，以激起新的創作可能，是張若谷開始翻譯的最初動

⁵ 張若谷曾自陳他自小在教會學校讀書，便十分喜愛拉封丹的寓言故事，他翻譯的拉封丹寓言發表在《小說月報》第十七卷、第十八卷 (1926-1927) 上。明末開始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已經開始陸續將寓言故事譯成中文，用以說明教義，如著名的《伊索寓言》，金尼閣 (Nicolas Trigault, 1577-1629) 口述，張賡筆傳的《況義》(1625) 便是其中最著名的。由張若谷的例子來看，傳教士翻譯西洋文學，尤其是兒童文學，對民初文學青年的養成，依然發生作用和影響。

⁶ 比如茅盾接手《小說月報》後，也曾指出，中國文學現在仍處在「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時代，宜趕緊輸入西洋文學藝術以求進步，促進中國文學從古典主義「進化」到新浪漫主義時代，並以此為辦刊理念 (茅盾, 1920)。

機，而法國文學的翻譯之所以成為張若谷的首選，一方面當然可歸因於他對法文的熟悉和偏好，此外，上文提及的曾樸（晚年寓居上海，致力於出版、翻譯法國文學的文人）之影響，也不能忽略。在曾樸為張若谷文集作的序中，曾樸回憶他如何和其視為忘年之交的張若谷相識，起因自兩人都熱愛法國文學：「我們一相遇，就要娓娓不倦的講法國的沙龍文學……。」此外，曾樸更認為，中國現代文學「好的固然不多；叫囂的，粗下的，也是觸目都是」，他和張若谷於是有了一個共同的想法：「我們並沒有什麼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只覺得我們的文學爬不上世界的文壇，想把外來的潮流，衝激起些浪花」（張若谷，1929，頁6）。事實上，這番宣言並不是曾樸第一次提出，早在曾樸給胡適覆信談及翻譯觀時，曾樸已經再三陳述他要翻譯異國文學，以沖刷當下文壇的陳腐之氣的決心（曾樸，1928，頁1-21），而法國文學既為他所偏愛，譯介時自然以之為首要之務。三十年代，曾樸便在上海法租界以法國浪漫主義的信條「真美善」為名，（曾虛白，1987，頁84）創辦了真美善雜誌社，定期出版雜誌以及法國文學翻譯作品。而當時初出文壇的張若谷，也和曾樸多有往來，開始有機會陸續發表其法國文學評述與翻譯。⁷

上文已提及，曾樸和張若谷提倡、響應的「異國情調」文學一說，其靈感即來自伏爾泰。研究近代中法文學交流的學者如錢林森便認為，十八世紀法國文學當中有一支以伏爾泰為代表的「哲理式異國情調」文學潮流（錢林森，1999），藉著描寫想像中的中國景物、道德與風俗，伏爾泰將異國，如中國，刻畫成一個烏托邦、理想國，通過突顯此理想國與法國之異，伏爾泰得以用文學作品諷刺法國社會的黑暗與專制，以期能改善法國文化。實際上伏爾泰不但在理論上曾提出向異國文學借火，以照亮本國文化的宣言，他亦有不少相關創作、翻譯實績與之相關，比如伏爾泰 1778 年知名劇作《伊蘭娜》(*Irène*) 參考了耶穌教士旅行中國

⁷ 比如《真美善》1929年2月的「現代女作家專號」，便是由張若谷負責主編，張若谷譯了署名婁曼德(Lemaitre)的法國作者之〈法國的女詩人與散文家〉“Les femmes de France (poètes et prosateurs)”一文，介紹法國女作家。曾樸介紹張若谷時，便以最近認識的小友稱之。

的筆記，1747年小說《查第格》(*Zadig*)則受到《今古奇觀》相當大的影響，伏爾泰的《中國孤兒》自然也可算入這個創作脈絡中。

識者都會指出，伏爾泰此類文學創作，涉及了一個通過書寫，觀看、詮釋他者，將他者「異國化」、「東方化」(Said, 1977)，以促成自身文化建構的歷程。然而張若谷不僅引用伏爾泰異國情調文學論述作為其翻譯、書寫的信條，還實際上翻譯了伏爾泰改寫的《中國孤兒》，期待以之復興、召喚中國國族精神。於是通過張若谷的改寫實踐，被伏爾泰觀看、描述的「東方」他者，此時反過來轉化了伏爾泰此一欲通過對東方他者的思考，來充實豐富自身法國文化的文學作品，重新凝聚了一個中國人的自我想像。而就在兩者的轉化間，一個雙重的觀看形成了，從後殖民學者的角度來說，此即所謂的「多重殖民凝視」(multiple colonial gaze)。⁸沿著這個思路，本文更想指出，這無疑也揭示了在上海這樣的跨文化接觸地，一種多元的、細緻的跨文化互化(transculturation)發生的可能。

而從文化翻譯的角度來說，則誠如韋努蒂(Lawrence Venuti, 1995)所言：

本土文化中特定的文化群體，控制著對本土文化中其他群體所作的異域文學的再現，抬高某些特定的本土價值而排斥另一些，並確立起因其服務於特定本土利益而必然是片面的異域文本典律。

(查正賢譯，2001，頁365-366)

翻譯項目不僅構建著獨特的異域文化的本土再現，而且因為這些項目針對的是特定的文化群體，它們同時也就參與了本土身份的

⁸ 殖民凝視(colonial gaze)通常指的是殖民者如何看待殖民地文化，尤其在攝影發達的十九、二十世紀，被殖民者如何被呈現、觀看，成為後殖民學者談論的重點，請見Mary Louise Pratt(1992)。而近來亦有學者指出，殖民性本身可能並非單純的壓迫、抵抗等二元模式可以概括，對於個案需要更細膩地梳理，比如阮斐娜對日治時期在台日人文學活動的研究，請見阮斐娜：《帝國的太陽下：日本的臺灣及南方的殖民地文學》(吳珮珍譯，2010，頁13)。

塑造過程。（查正賢譯，2001，頁 371）

伏爾泰改編《趙氏孤兒》成《中國孤兒》，將原劇歌詠的忠義精神，轉化成強調道德優於暴力，且能超越武力的人道主義精神，以期能以之針砭當時時局。而在張若谷的翻譯中，這個人道主義精神又與傳統中國的忠孝節義精神跨文化地結合在一起，再現出了一個張若谷的「理想中的中國」，期待能開創中華民族的新局。由此，熟悉伏爾泰作品的張若谷，通過《中國孤兒》再現的不只是作為他者的法國，被法國人觀看的古老中國，還有他理想中的中國，充分演繹了上文所提及的，翻譯不但可能再現了異域文化，同時也參與了一地本土文化的塑造。

另外，上文已論及，伏爾泰之新編趙氏孤兒以及張若谷的翻譯，都以原著為基礎，進行了想像的加工或藝術性的創造，而兩者的翻譯、改寫策略都受到作者／譯者身處的情境之影響。比如伏爾泰，他將原劇中涉及的時代背景更改為宋末元初，將捨兒救孤的大臣張惕刻畫為能在大亂中以高尚道德情操守住氣節，感動敵人的形象，並增添女性角色的戲劇張力，彰顯了伏爾泰所力圖宣揚的啟蒙思想，及其所面對的文化環境。而本文接下來便要對張若谷所面對的翻譯情境與文化場域，進一步進行梳理。

張若谷翻譯、連載《中國孤兒》時，所面對的是戰火連天、言論受限的孤島上海。⁹ 曾經繁華一時的東方明珠其時因戰火煙硝而蒙塵，僅剩租界維持表面榮華。其時上海文壇，因日人的言論管制，中文出版多受限制，電影、話劇也屢遭查禁，西人經營的報刊能逃脫文網檢查，因此有些中文報刊只好掛上外商招牌，爭取言論空間，許多作家便在此類報刊上發表作品（楊幼生、陳青生，1994，頁 2），如張若谷之《中國孤兒》翻譯連載於《中美日報》。

⁹ 一般說來的上海孤島時期，指的是 1937 年上海四郊為日軍佔領，至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入租界為止。此段期間，因租界宣布中立，四周被淪陷區包圍，而有「孤島」之稱。孤島時期上海特殊的都市治理背景，也影響了當時的文學生態與發展。

面臨艱難的時代，當時的創作者、譯者很難不以作品回應、刻畫人類所面對的此一生存境遇之考驗——殺戮與死亡。而一直積極致力於翻譯異國文學作品，以刺激現代中國作家寫作、提倡以文學之復興，作為民族文化新生基礎的張若谷，早年雖曾沈浸都會文化、耽於書寫現代感受，但在中日戰爭爆發後，他也一度投身戰地記者的工作，為《大晚報》撰稿，並翻譯伏爾泰的作品在報上連載，以期能鼓舞士氣。此一文學風格的轉折雖難與他都會作家的形象聯想在一起，但考量他一貫的復興中國文學之思想背景，其轉變卻也是不難理解的。

除此之外，張若谷也在面對著一個丕變的文學環境。對日戰爭時期，上海文壇爆發了一連串的抗敵救亡文藝運動，即所謂的「抗戰文藝」，戲劇領域也不例外。這時期上海灘頭的戲劇演出雖較零落，但仍有劇作家和劇團創作、演出不輟。¹⁰ 其中，重塑歷史題材，於其中寄託國家興亡意涵的「愛國話劇」，更所在多有，且反響很大，著名的有阿英的《碧血花》（又名《明末遺恨》，1939）、¹¹《海國英雄》等劇，以明末抗清的歷史故事為題材，因悲壯昂揚，演出時獲得觀眾很大的迴響（陳青生，1995，頁102；邵迎建，2012，頁42）。此外譚正璧的《梅花夢》（1946）更因表現敵愾精神與民族意志，三度公演，頗受歡迎（陳青生，2002，頁78）。這類作品以歷史上奮勇抵抗外族入侵的事件為戲劇經緯，寄託了作家、觀眾的愛國情懷，都曾造成觀戲熱潮。¹²

此外，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也曾出現過可觀的改編劇風潮。當時的劇作家或翻譯者時常對外國作品的思想或主題進行改編或改譯，以反映中國當時的社會狀況。知名的法國戲劇翻譯家李健吾便曾提出，改編劇

¹⁰ 對日戰爭初期，面對民眾高漲的情緒，各種描述現實、宣傳愛國精神及鼓舞士氣的作品紛紛湧現，有「抗戰文藝」之稱。戲劇領域的參與者不落人後，比如中國劇作者協會和上海戲劇救亡協會的成立，以及戲劇界與文學、電影界集體編導抗日話劇《保衛蘆溝橋》，著名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引起的廣大迴響，都是其例。相關研究請見陳青生（1995）。

¹¹ 此劇於1940年，還由中國旅行劇團與明星電影合作，改編成電影《葛嫩娘》，強調「民族英雄、至死不渝」的精神，也很賣座。

¹² 邵迎建在其研究中指出，曾有日本觀眾為戲中文天祥高喊「還我大宋天下」台詞，引起全場轟動叫喊的情狀感到驚訝，並不以為然。請見邵迎建，2012，頁304-306。

的佳作應是「利用原作的某一點，或者是結構，或者是境界，或者是哲理，然後把自己的東西填了進去」（李健吾，2010）。很能代表當時劇作家改編、改譯國外劇本的心態。抗戰時期，改譯戰爭題材或描寫民族精神的外國戲劇作品更蔚然成風，數量甚至一度超過原創劇本（劉欣，2009，頁19）。著名的如《民族萬歲》、陳白塵、宋之改譯自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的《威廉退爾》（*Wilhelm Tell*）一劇。而留在上海的劇作家，雖因政治環境嚴峻，不能直接在劇中描寫抗戰，但通過譯介、改編國外戲劇作品，他們也得以藉此傳達自己的心聲。李健吾的名作《王德明》（又名《亂世英雄》，1945）便是一例。這齣根據莎劇《馬克白》（*Macbeth*）改編成的六幕劇，背景被劇作家置換成五代十國時期的中國，李健吾借助原故事梗概，代入王德明弑父篡位的史實，甚至加入了《趙氏孤兒》中程嬰救孤的情節，將莎劇改譯成了一齣新劇，此劇演出後，因其鼓舞、激勵觀眾愛國抗戰精神之效果，頗受矚目（聶蘭、熊輝，2012）。

由上所述，可以發現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創作愛國話劇及改編西洋戲劇作品以寄託個人理想，一度蔚然成風。不論是作者選擇中國歷史題材改編，於其中投注期待民族復興意識；或在改編（或翻譯）西方劇作的過程中，對原作進行一些創造性的演繹，都是當時常見的一種現象，且這類戲劇作品也在抗戰初期的上海，曾成功地引起觀戲的熱潮，張若谷《中國孤兒》的翻譯實踐，便誕生於同樣的翻譯情境。而從此一角度來考察張若谷的《中國孤兒》翻譯，則我們可將其錯漏之處與改編，視為對中日戰爭此一時代脈絡及當時改編、改譯戲劇作品的文學環境的回應。

綜之，通過考察張若谷的文學創作、翻譯歷程，我們可以發現，張若谷翻譯《中國孤兒》的實踐策略，實乃與其對翻譯活動的理解和目標有關，更回應著他所面對的時代背景。他以異國文學刺激中國文化新生的願景，以及身處戰時中國的脈絡，都影響了張若谷的翻譯實踐。儘管張若谷並未譯出完整的《中國孤兒》，對於原劇詩歌體的形式也有所忽

略，再加上對若干情節、人物形象的弱化，都顯示了張若谷的《中國孤兒》翻譯實績的確有待商榷；而在戰時，此一譯本的出版也沒有促使讀者在感時憂國以外，對伏爾泰及其作品有進一步的認識，但本文想著重提出的是，翻譯活動既可被視為是一跨文化轉化與實踐，同時也是對異國他者的詮釋和建構，在以張若谷為例的中國現代作家身上，我們還可以看出翻譯如何成為他們想像新中國的一種方法，如同彼時伏爾泰想像一個更美好的法國。儘管張若谷的此一翻譯實踐對於幫助當時中國讀者理解伏爾泰與十八世紀的法國文化、思想的作用並不全面，於文化互動及交流上貢獻不多，對於中國讀者建構自我國族形象的效果也有待考察，然通過跨文化轉化異國他者對中國的異域想像，本文指出，張若谷的翻譯實踐仍顯示了一條中國現代文學作家建立本土認同的可能路徑，更彰顯了所謂的異國情調文學潮流如何聯繫起了十八世紀的伏爾泰與二十世紀的曾樸、張若谷，形成了一個近代的文學潮流跨文化流動的圖景，而更完整的《中國孤兒》翻譯，只能有待來者。

伍、結語

《趙氏孤兒》由中到西、由西到中的跨國行旅，從《趙氏孤兒》變身為《中國孤兒》的前半身世，多有學者關注，並提出精彩的研究成果，然《中國孤兒》如何譯成中文，相關研究則一直較少受關注。本文從耙梳伏爾泰改作《中國孤兒》一劇始末開始，再通過對比閱讀，考察張若谷譯伏爾泰《中國孤兒》一劇的翻譯策略與成績，最後縮結貝曼和韋努蒂的翻譯論述，剖析張若谷翻譯《中國孤兒》的文化意涵。

本文指出，張若谷的《中國孤兒》翻譯並不完全忠實，其譯作偶有刪節或更動。如研究者指出，譯者的視野、身處的脈絡，頗能影響其詮釋和翻譯異國文學，而考察張若谷之文學意見，可以發現他頗為認同伏爾泰的異國情調文學論述，欲以翻譯異國文藝充實中國現代文學；此外，張若谷在戰時翻譯伏爾泰的《中國孤兒》，為鼓舞士氣，故著重呈

現中國人的愛國精神，以期救國於危亡之間，由是，翻譯異國也成為一種想像新中國的方式。張若谷的翻譯更值得深究的還在於其《中國孤兒》的翻譯實踐，乃中國譯者對一個被異國作家異域化想像的中國故事進行轉化，此間的雙重觀看與互涉，聯繫起了一個長達數世紀之跨文化流動圖景，本文以為，這也是張若谷的《中國孤兒》中譯之所以值得吾人關注的原因。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 吳珮珍（譯）（2010）。*帝國的太陽下：日本的臺灣及南方的殖民地文學*（原作者：阮斐娜）。臺北：麥田出版社。（原著出版年份：2003）
- 宋耕（譯）（2001）。我們讀到的是「元」雜劇嗎？雜劇在明代宮廷的壇變（原作者：W. L. Idema）。*文藝研究*，3，97-106。
- 李紀祥（2000）。趙氏孤兒的「史」與「劇」：文術與演述。*漢學研究*，18（1），209-236。
- 李健吾（2010）。《大馬戲團》與改編。今載於劉增傑（編），*師陀研究資料*（頁240-241）。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
- 杜欣欣（2010）。文學、翻譯、批評：從貝爾曼翻譯評論看馬若瑟之《趙氏孤兒》。*編譯論叢*，3（2），61-99。
- 周允中（2000）。有關張若谷的一些往事。*魯迅研究月刊*，9，86-88。
- 邵迎建（2012）。*上海抗戰時期的話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查正賢（譯）（2001）。翻譯文化身份的塑造。（原作者：L. Venuti）。載於許寶強、袁偉（選編），*語言與翻譯的政治*（頁359-383）。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原著出版年：2000）。
- 范希衡（2010）。《趙氏孤兒》與《中國孤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茅盾（1920年1月1日）。我對於介紹西洋文學的意見。*時事新報·學燈*，副刊。
- 尉天驄（1977）。「趙氏孤兒」與歐洲的古典精神。*幼獅月刊*，45（5），58-60。
- 張元濟（1937）。*中華民族的人格*。上海：商務印書館。
- 張若谷（1928）。*文學生活*。上海：金屋書店。
- 張若谷（1929）。*異國情調*。上海：真美善書局。

- 張若谷（譯）（1942）。《中國孤兒》（原作者：Voltaire）。上海：商務印書館。（原著出版年：1755）
- 許鈞、錢林森（譯）（2008）。《中國之歐洲：西方對中國的仰慕到排斥【下卷】》（原作者：R. Étiemble）。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原著出版年：1988、1989）
- 陳正敏（2008年4月3日）。伏爾泰的中國文化想像以《中國孤兒》為中心。愛思想網站。取自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8228>。
- 陳受頤（1929）。十八世紀歐洲文學裡的趙氏孤兒。《嶺南學報》，1（1），114-146。
- 陳青生（1995）。《抗戰時期的上海文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陳青生（2002）。《年輪：四十年代後半期的上海文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曾虛白（1987）。《曾虛白自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曾樸（1928）。病夫覆胡適函。《真美善》，1（12），1-21。
- 楊幼生、陳青生（1994）。《上海「孤島」文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董純、丁一凡（譯）（1991）。《趙氏孤兒》的演變——伏爾泰與中國模式（原作者：René Pomeau）。《國外文學》，1991（2），6-16。
- 熊月之、馬學強編（2003）。《上海的外國人（1842-19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劉欣（2009）。《論中國現代改譯劇》。上海：上海戲劇學院博士論文。
- 錢林森（1999）。法國文學中的中國題材與異國情調——中法文學交融的一個歷史特徵。《南京大學學報》，2，128-134。
- 聶蘭、熊輝（2012）。論抗戰時期外國戲劇的中國化改編——以李健吾對莎士比亞兩部悲劇的改編為例。《廊坊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16（2），49-52。

英文文獻

Berman, A. (2009). *Toward a translation criticism: John Donne* (F. Massardier-

- Kenney, Trans.). Kent, OH: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Liu, W. C. (1953). The original orphan of Chin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5(3), 193-212.
- Pavis, P. (1996). *The intercultural performance reader*. London, England: Routledge.
- Peng, H. Y. (2010). *Dandyism and transcultural modernity: The dandy, the flâneur, and the translator in 1930s Shanghai, Tokyo, and Paris*. New York, NY: Routledge.
- Pratt, M. L. (1992).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England: Routledge.
- Said, E. (1977). *Orientalism*. London, England: Penguin.
- Schechner, R. (2002). *Performance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Venuti, L. (1995). Transl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ies. In C. Schäffner & H. Kelly-Holmes (Eds.), *Cultural functions of translation* (pp. 9-25). Clevedon, England: Multilingual Matters.

法文文獻

- Du Halde, J. -B. (1735). *Description de l'Empire de la Chine* (vol. 2). Paris, France: P. -G. Le Mercier.
- Pinot, V. (1932). *La Chine et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philosophique en France (1640-1740)*. Paris, France: Geuthner.
- Voltaire. (1755). *L'orphelin de la Chine*. Paris, France: Michel Lambert.